

书评

In the Footsteps of AUGUSTINE HENRY and His Chinese Plant Collectors

Seamus O'Brien, *In the Footsteps of Augustine Henry and his Chinese plant collectors*, foreword by Roy Lancaster OBE VMH, published by the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Ltd, and its imprint, Garden Art Press, Woodbridge, Suffolk, UK, 2011, p. 367; ISBN 979-1-87067-373-0, price £ 40.00, USD \$ 85.00; R. Schmid, 2012, Book Review, *Taxon* 61 (5): 1149–1151.

这是一部关于爱尔兰人 Augustine Henry (1857–1930) 在华期间 (1885–1900) 采集植物以及引种过程的记述专著, 格式与 *Wilson's China: A Century on* (Tony Kirkham & Mark Flanagan, 2009, 256 p, London, Kew Publishing; 书评参见彭玉兰、马金双, 2010, 威尔逊来华采集百年纪念, 云南植物研究 32: 473–474) 非常相似; 但主人公则是另一位采集中国植物的著名人物、也是曾经指导过威尔逊等如何采集并引种中国植物的大师, 其内容更丰富、更详细; 无论从历史学还是从社会学、无论是从植物学还是从生态学、无论是分类学还是园艺学、无论是科学考察还是学术研究, 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 都非常值得借鉴。

Augustine Henry 1857 年生于爱尔兰一个杂货商的家庭, 一个姐姐和四个弟弟; 自幼聪明, 1877 年以优等生毕业于爱尔兰的 Queen's College, Galway (今爱尔兰国立大学 Galway 分校), 主修自然科学与哲学; 1878 年又于 Queen's College, Belast (今皇后大学) 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1879 年学医, 在来中国之前于 1880 年在爱丁堡取得从医的资格; 1881 至 1900 年服务于中国海关, 回国后赴法国学习林学, 和 Henry J. Elwes (1846–1922) 合著英伦的著名树木学专著 *The Trees of Britain and Ireland* (1~7 卷, 1906–1913), 1907 年进入剑桥大学林学系先后任高级讲师和教授, 1913 年回爱尔兰任都柏林大学林学系第一任主任兼教授直至 1926 年退休。

Augustine Henry 于 1881–1900 年作为中国海关的全职人员 (开始时任帮办兼医生助理, 后升任地方海关负责人), 从 1885 年至 1900 年的 15 年间先后在湖北宜昌 (1885–1889)、海南海口 (1889)、台湾高雄 (1892–1894)、云南蒙自 (1896–1897, 1899–1890) 和思茅 (1898–1899) 等地大规模采集植物, 其标本数量达 158 000 份 (15 700 多号), 所涉物种数目达 6 000 多 (约占今日中国维管束植物物种总数的五分之一); 其中包括 5 个新科 37 个新属 1 726 个新类群 (包括种下等级)。他在中国采集与发现的植物数量, 不要说业余采集人员, 就是专业采集家也无人可比。有关 Augustine Henry 的传记及采集等情况可以参见 Arthur C. Forbes, 1930, Augustine Henry, *Quarterly Journal of Forestry (London)* 24: 169–173; Alfred B. Rendle, 1930, Augustine Henry, *Journal of Botany* 68: 148–149; John W. Besant, 1935, 'Plantae Henryanae', *Gardeners' Chronicle*. 98: 334–335; Frederick W. Moore, 1942, Augustine Henry, *Journal of 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 of London* 67: 10–15; Brian D. Morley, 1979, Augustine Henry: His botanical activities in China, 1882–1890, *Glasra* 3: 21–81; & 1980, Augustine Henry, *The Garden (London)* 105 (7): 285–289; E. Charles Nelson, 1983, Augustine Henry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hinese Flora, *Arnoldia* 43 (1): 21–38。

Augustine Henry 可谓是世界上著名的中国植物采集家, 所到之处不仅自己亲自采集, 而且还训练并雇用当地人采集; 如在湖北巴东雇用的杨姓采集员以及在云南蒙自雇佣的何姓采集员等都跟随他多年; 他们不仅能够独立采集而且熟悉当地情况并能够深入人烟稀少的大山里采集非常稀有的物种; 有的不仅能够在他的周围采集而且还在他离开湖北到外地工作后继续在湖北为他采集; 除周末和节假日采集外, Augustine Henry 还征得海关的同意长时间远行专门采集。1888 年 3 月至 10 月, 他就利用在宜昌工作的便利雇用 24 名当地人对湖北西部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 足迹遍及长阳、野三关、建始、

兴山、房县、神农架以及四川的巫山等地,半年时间采集植物标本 27 400 份。他对中国植物的收集可谓全力以赴凡有机会绝不放过。1889–1890 年英国动物(特别是昆虫)采集家 Antwerp E. Pratt 去四川和西藏采集,尽管此时 Augustine Henry 已经被派往海南海口海关,他还是派自己在湖北训练的中国采集人员随同并获得大量的珍贵物种。Augustine Henry 刚来到宜昌便跟随邓姓人士学习中文,这不仅为他日后的工作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也使他逐渐成为当时来华外国生物采集方面的联络人或曰指点者,他帮助或协助过多个国家的此类人员,包括英国的 Antwerp Edgar Pratt、Reginal Farrer、Alexander Hosie、德国的 Ernst Faber、美国的 W. Woodville Rockhill 等;更不要说那些对中国植物感兴趣的世界名流,如 Emil Bretschneider (1833–1901)、David Fairchild (1869–1954)、Charles Ford (1844–1927)、William Hancock (1847–1914)、Sir Harry James Veitch (1840–1924) 等,即使离开中国回爱尔兰后他们都保持密切的联系。

Augustine Henry 在 1881 年刚到中国时并没有多少植物学知识,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将来会同中国植物打交道。但日常工作中经常在海关检验各类中药材,并逐渐地开始识别植物并采集植物;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他开始和英国驻广州副领事、著名植物学家 Henry Fletcher Hance (1827–1886) 联系,并得到他的指点;后来他又主动联系当时的邱园园长 Joseph D. Hooker (1817–1911),后者阅历非浅,马上意识到中国植物的重要性,于是千方百计往返信件指导 Augustine Henry 的野外工作并嘱咐做好详细的野外纪录等。Joseph D. Hooker 不久退任,继任者也是女婿 Sr. William Turner Thiselton–Dyer (1843–1928) 继续和 Augustine Henry 保持紧密联系。Augustine Henry 寄回邱园的植物标本由邱园植物分类学家 William B. Hemsley (1843–1924) 等鉴定并给他寄回所采集的植物名录。Augustine Henry 在中国 15 年的采集成果,也是 Francis B. Forbes & William B. Hemsley 完成三卷本 *Index Florae Sinensis* (1886–1905) 的主要依据。他不仅和邱园联系,还和美国哈佛大学树木园首任主任 Charles Sargent (1842–1927) 以及英国具有影响的 Harry James Veitch (1840–1924) 等联系,不仅与他们交流中国采集植物的体会,而且千方百计地说服他们,派专业采集人员到中国的西部大山里,因为那里有更多未知的植物,很多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观赏植物和药用植物。正是他的说服与努力,后来英国派出了 Ernest H. Wilson (1899–1918) 和 Francis Kingdon Ward (1906–1956)、美国派出了 Joseph F. C. Rook (1920–1949) 和 Frank N. Meyer (1905–1918)、苏格兰派出了 George Forrest (1904–1932) 等专业采集人员在中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采集与引种。可以说,Augustine Henry 是继 Robert Fortune (1812–1880) 之后,开启西方大规模采集中国植物的大师级人物与领路人;没有他,西方了解中国植物的时间要大大推迟。

Augustine Henry 通过在中国的采集与整理,出版了 *Notes on Economic Botany of China*, 68 p, 1893,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该书对西方了解中国的经济植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到 1986 年还被印刷过。Augustine Henry 在中国的植物采集工作不仅成就了他一生的事业,而且繁荣了欧美园艺界,以至今天后人还在纪念他。他采集百年后,分别有 *The Wood and the Tree, a biography of Augustine Henry*, Sheila Pim, 256 p, 1966, London: MacDonald; 2nd ed, *The Wood and the tree: Augustine Henry, a biography*, 252 p, 1984, Kilkenny, Ireland: Boethius Press 和 *An Irish Plant Collector in China: Augustine Henry*, 42 p, 2002, Irish Garden Plant Society 问世。本文介绍的 *In the footsteps of Augustine Henry and his Chinese Plant Collectors* (2011) 则是第三本有关专著。

全书共分 13 章:中国新生、筏探宜昌、巡迹四季、华中屋脊、宜昌朝圣、西藏雪域、转赴海南、台湾热带、沪港赴台、云南蒙自、转赴思茅、奇旅终结、林学大师。本书采用章节式回忆叙述与追踪采访相结合的方式,不仅追溯当年的采集路线与经历及其后来的引种成果,而且包括今日中国的自然资源与风土人情介绍。这样的编排非常独特,让人感到连贯又循序渐进具有重游旧地之感,不仅走回历史更走进现实。书末有 6 个附录:包括纪念 Augustine Henry 采集的植物名录(包括 5 个新科和 37 个新属、180 多种以他命名的植物、27 个依据他的采集地点命名的植物、31 个命名于他的朋友和同

事的植物等)、中文地名(包括新旧拼法)、Augustine Henry 生平编年、名词术语、章节注释、参考文献,以及植物学名索引、地名和人名索引。

作者 Seamus O'Brien 生于 1970 年,爱尔兰园艺工作者、植物采集家,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及喜马拉雅地区等,先后两次获得 Christopher Brickell Prizes 奖,两次获得英国皇家园艺学会的资助,被誉为当代爱尔兰的著名中国温带植物专家;现负责爱尔兰国家植物园的 Kilmacurragh Botanic Gardens。他为了写 Augustine Henry 的采集专著,前后历时 5 年整理 Augustine Henry 采集的各类中国植物标本 15 万多份,先后 3 次带队共 10 多人来中国实地考察(2002, 2004, 2005),并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等有关人员的帮助下重走当年 Augustine Henry 的路线,不但获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还引种了大批的中国植物。为了收集素材,他还到欧美等地访问了多个研究并引种中国植物著名的植物园与树木园,走访了多个著名中国植物采集人的后代,包括 Augustine Henry 的后人等。当然该书并非完美无瑕,特别是对三峡大坝的修建及其产生的影响等评论,相信读者能够从中分析吸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今日中国植物资源现状和百年前 Augustine Henry 时代相比的明显变化则是不争事实!

该书利用翔实的历史资料,一方面根据日记以及来往书信与档案等,记述了当年 Augustine Henry 等人的采集与引种的详细过程与具体内容,另一方面通过作者百余年后重访故地,记述当今中国的变化,特别是植物资源和景观生态等,同时再次引种这些丰富多样的中国植物到爱尔兰等地,所用的资料十分丰富、所有的考察与注释十分详细,同时配有 430 张彩色图片和近 100 张珍贵的历史黑白图片,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不仅是一部中国植物的采集史,更让人感到西方社会对自然与历史的探索、对资源与引种的追求、对历史人物和他们工作的酷爱;更让我们佩服的是当代西方专业人士的文化底蕴及敬业精神。

100 多年过去了, Augustine Henry 采集的成果虽然没有像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首任主任 Charles S. Sargent (1847-1921) 主编的三卷本 *Plantae Wilsonianae* (1911-1917) 那样正式出版,但他的采集内容以及对中国植物的研究与引种早已载入史册。然而,作为“园林之母”的中国,历史上西方采集植物资源的大国,至今自己没有一部基本的采集历史,更不要提完整的或比较完整的!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发达的爱尔兰、世界著名的植物园,如此年轻的园艺工作者花这么大的力气、投入如此长的时间和精力编写出版这样的工作,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迪或反思呢?难道我们的植物园比人家办得更好更漂亮更吸引观众?还是我们的工作远远高于人家、可以不管什么学科都一味地盲目追求 SCI 文章和影响因子?

历史既能冲走浮尘永留真迹,又能折射虚假鞭策后人。

马金双,中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上海辰山植物园
(E-mail: jinshuangma@gmail.com);

叶文,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植物系统进化与生物多样性实验室